

生态的认知：关于伦理符号学的反思

Ecological Cognition: A Reflection on Semioethics

张 杰 (Zhang Jie) 余红兵 (Yu Hongbing)

内容摘要：意义生成是当代符号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把意义的符号呈现、现实生活的伦理旨趣与释放意义、关爱生命相互融合在一起，是伦理符号学与精神文化符号学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本文依据《易传》中的“各正性命”思想，在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视域下，基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相关论述和文学创作实践，对伦理符号学进行反思。通过“符号”与“症状”、“大脑”与“身体”、“文本”与“本体”之间关系的分析，强调关爱包括“己者”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甚至把非生命体也视为是“个性”，以此彰显一条回归自然、返回本体、释放意义、追求自由的符号学研究路径。这条路径的特色，是从生态的视角来看认知，即将认知视为一种生态活动。

关键词：各正性命；意义生成；伦理符号学；精神文化符号学

作者简介：张杰，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国际符号学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符号学与外国文学；余红兵（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多伦多都市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美国符号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符号学、比较哲学与认知。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体裁演变史研究”【项目批号：21AWW004】阶段性成果。

Title: Ecological Cognition: A Reflection on Semioethics

Abstract: Meaning generation is a central issue in contemporary semiotics. How to integrate the symbolic presentation of meaning, the ethical intentions of real-life situations, the release of meaning, and the care for life into a coherent framework is a shared objective of semioethics and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 as situated” found in the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Changes*, this article his article engages in a reflection on semioethics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It does so by drawing upon relevant discussions i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creative practic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igns” and “symptoms,” “brain” and “body,” “text” and “being,”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for all forms of life, including “the self,” and even extends this consideration to non-living entities, viewing them as possessing “individuality.” This approach highlights a path of semiotic research that involves returning to nature, being, the release of meaning,

and the pursuit of freedom. This path is characterized by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cognition, that is, treating cognition as ecological activity.

Keywords: life as situated; meaning-generation; semioethics;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uthors: **Zhang Jie** is Senior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 His primary research areas include semiotics and foreign literatures (Email: z-jie1016@hotmail.com). **Yu Hongbing** is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Faculty of Arts at 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Toronto M5B2K3, Canada) and President of Semiotic Society of America.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ultural semiotic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cognition (Email: hongbing@torontomu.ca).

聂珍钊、王松林曾指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由三个选择阶段构成的，即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和科技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¹⁾。可以说，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两大重要标志。然而，科学技术在不断改善人类社会生活的同时，又反过来控制着人本身；伦理道德一方面提升人类的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压抑人的个性。这似乎就构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人类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难道就只是从对自然客体或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归纳出某种规律或规范，且必然要以牺牲人的个性乃至人性为代价吗？认知行为的发生者是自然和身体，还是人及其大脑？这些问题，其实都可以从符号学的跨学科视角来审视。¹

意大利学者苏珊·佩特里利(Susan Petrilli)和奥古斯都·庞奇欧(Augusto Ponzio)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对上述部分问题做出了初步探讨。该理论秉承了美国符号学家托马斯·阿尔伯特·西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反“人类中心主义”和反“语言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全球视域下的“关爱生命”(care for life)²。其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开辟了将科学与伦理、符号与意义、他者与己者、大脑与身体等融合研究的路径。然而，在我们看来，该研究还应进一步拓深，不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还要提倡与生物界以外的非生命体的平等，实现更广义也更深刻的全球视域。

1 这里的符号学，我们取其广义，即跨学科的方法论工具。也可将其视为研究意义生成的学间(inquiry)。

2 参见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Semioethic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ited by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2010, 151.

本文沿着伦理符号学开辟的路径,结合精神文化符号学¹的观点,对以上问题展开进一步探索。我们将依据《易传》中的“各正性命”思想,聚焦文学创作实践,同时也对符号学的方法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并非用语言符号弘扬人类某一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就是关爱生命。相反,符号学研究应该通过回归自然本体,让意义充分释放,关爱包括“己者”在内的一切生命体,甚至把非生命体也视为是广义的“个性”。这才是把符号学与生命真正融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担负起符号学研究的科学使命和伦理责任,从生态视域下的认知维度,探索一条回归自然、返回本体、释放意义、追求自由的符号学研究路径。

一、“关爱生命”：“符号”与“症状”

符号学作为研究意义生成的学问,早已为人们揭示:任何意义的符号表征又无法避免“遮蔽”现象,符号表征越复杂,人离所表征的事物的“本体”越遥远。²人似乎被悬置、包裹在自己创造出来的各种符号之网中,这个网是意义之网,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维度。³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如果依旧沿着知识积累、规律探索或意义表征的道路前进,已然明显不足,甚至人脑都有被人工智能超越的可能。AlphaGo 在 2016 年挑战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并取得 4-1 的胜利,就是很好的例证。如何走出语言表征的困境,“超越”科技选择,已经不再是传统符号学自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引入生命的视角,而“伦理符号学”就是一个较好的理论尝试。

伦理符号学是一种研究意义生成的独特方法与态度。它显示出迥异于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发展轨迹的反向意义生成,即不再是从对自然客体或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归纳出某种科学规律或伦理道德规范,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佩特里利和庞奇欧依据西比奥克的生物符号学理论,从源头上探寻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认为符号学起源于以生命健康为宗旨为核心的症状学 (semeiotics 或 symptomatology),甚至将希波克拉底(约前 466- 前 377)视为符号学之祖。然而,伦理符号学并非要根据“症状”医治病患,而是“关爱生命”。所以我们不妨将“症状”一词理解为生命力的各种身体表达,像“体态”一般的呈现⁴,是对生命内在价值的认同与尊重,而不是作为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毛

1 参见 张杰、余红兵:“反思与建构: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符号与传媒》1 (2021): 1-13。

2 参见 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25.

3 参见 Yu Hongbing, “Confucius the Untouchable: On the Semiotics of Historization,”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3 (2022): 319-412.

4 对照精神文化符号学对“精神”的定义:由心灵、生命力与创造力共同形成的流动变化的整体。参见 Zhang Jie and Yu Hongbing, “A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 Manifesto,”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4 (2020): 517.

病”。正如佩特里利和庞奇欧所言：“重要的是明确‘关爱’之不同于‘根治’或‘治疗’。以符号活动即生命¹为中心而关注病征的符号学者，并不是医生，也不是一般从业者或专家（……）今天的符号学必须要恢复人类符号活动的价值论维度”（151）。

伦理符号学把符号学与生命研究联系在一起，以“关爱生命”为目的，体现了一种在当今全球语境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键的研究方法、视角和方向。它似乎拓展出了一条从“症状”→“身体”→“本体”的符号学研究路径，不再沿着“符号”→“文本”→“文明”的轨迹前进。伦理符号学要在人类进入“科技选择”时代之际，从运用符号表征意义，返回到生命体本身。这种反向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是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相悖的，更能够彰显生命体的伦理价值。人类无法沿着科学技术的跑道匹敌人工智能的演算力和发展速度，或许相悖而行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从符号表征返回本体，至少可以使得意义敞开，给予人类无限的可阐释空间。这也是符号学回归生态，返回人体本身的认知探索。

这个思路上的启示，放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尤其合适。我们以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1992）为例。该小说曾引发过读者和文学批评界的广泛争议。在改革开放初期，当该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公开上映时，甚至遭到了部分观众的联名反对。他们将主人公安娜视为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不应该被塑造成一位追求新生活的女性。其实，作者托尔斯泰一开始的本意，就是想将安娜描写成一个“不贞洁”的女人。²文学批评界从社会伦理道德和文学的教诲功能出发，也对安娜形象有过相关的评论。不过，在俄罗斯文学的教科书和文学史的评介中，安娜又被无可争议地肯定为追求新生活的女性典型，是世界众多文学经典形象中当之无愧的一员，安娜的爱情悲剧强烈地震撼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那么究竟该如何评价主人公安娜有违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安娜到底是在与上流社会的恶劣环境相抗争、追求新生活，还是在道德沦丧呢？如果简单把安娜归结为道德败坏的女人，显然是不合适的，但从关爱“他者”的伦理维度来看，又很难把她抛夫弃子、与沃伦斯基私奔的行为肯定为女性追求新生活的表现。然而，如果从伦理符号学的回归“症状”、“己者”和“关爱生命”的视角出发，细致地分析主人公安娜不同场合的言谈举止等“体态”特征，读者就不难发现安娜性格的矛盾复杂性及心理演变的过程。任何一种简单的概括和归纳都是不合适的，应该从返回人体的生态维度，回到人物形象

1 佩特里利和庞奇欧秉承了西比奥克辩证的生命符号观，即一切生命的标准特征是符号活动，而符号活动即预设了生命，二者互为条件、互相定义。参见 Thomas A. Sebeok,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2 托尔斯泰是在痛苦写作、反复阅改的过程中，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全新、真实的安娜。参见 Bob Blaisdell, *Creating Anna Karenina: Tolstoy and the Birth of Literature's Most Enigmatic Heroine*,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20, 9.

本身，向读者敞开活生生的安娜。

从托尔斯泰对安娜的“症状”描写来看，她一开始“引人注目的只是她这个人：雍容，潇洒，优雅，同时又快快活活，生气勃勃”（93）¹，“眼睛里那颤动的、闪烁不停地光芒，那情不自禁地浮现在朱唇上的幸福和兴奋的微笑，还有那格外优美、利落、轻盈的动作”（95）。不过，托尔斯泰也在安娜的“症状”中埋下了伏笔：“在她的美艳之中有一种可怕的、残酷的意味儿”（97）。作家用浓烈的笔墨渲染了安娜被爱情燃烧的“体态”：“她满面红光，但这红光不是喜悦的光彩，却像是黑夜里熊熊大火的火光”（166）。后来，安娜在观看沃伦斯基赛马时，面部情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安娜脸色煞白，异常紧张”（237）。尤其是沃伦斯基跌落下马时，“安娜‘哎哟’大叫一声，（……）她简直失魂落魄了”（238）。后来，当沃伦斯基开始冷落和厌烦安娜时，她“含着绝望和怨恨的泪水”（605）在叫喊。她在走进车站，临卧轨自杀前，“又是时而感到有希望，时而感到绝望，使一颗受尽摧残、恐惧地怦怦跳动着的心痛上加痛”（837）。小说中安娜身体和心理各种“症状”的展示，揭示了安娜的美丽、爱的炽烈和紧张以及复杂的心态。

《易传》有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王弼 2）。万物都在演变，在变化中实现自己的“性命”（天生之质与后天禀受的结合），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应有的“生态位”（niche）²。此即所谓“各正性命”。简而言之，就是“己者”在流动变幻中保持相对的自稳态（homeostasis）³，因此对文本复杂内涵的任何单维度解读显然又是不够的。如果尽量避免概括和归纳产生的片面性，从“己者”及其身体“症状”出发，或许对于《安娜·卡列宁娜》等世界文学经典的伦理价值判断，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读者就会更加关注安娜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会为她的悲剧感到震撼和惋惜。相照而言，《安娜·卡列宁娜》的作者托尔斯泰在创作的艺术构思中，确实宣扬着关爱“他者”的伦理道德观，但如果作者在生活中既关心“他者”，又稍许多一些自我关怀，也许就不会离家出走，最终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其实，关爱自我与呵护他人是同等重要的，并非也不应该是对立的。由此看来，伦理符号学批评可以改变一般的阐释路径，不再以作家的创作观念呈现为重点，而是走出符号表征的局限，通过人物“症状”的揭示与体悟，回归形象本身的“体态”，包括复杂的“心态”。这与精神文化符号学所倡导的意义释放和阐释空间自由是一致的：“任何试图给符号以确定意义的研究都是在约束作为‘个性’的符号自由，只能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符号进行局部意

1 本文有关《安娜·卡列宁娜》的引文均来自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宁娜》，力冈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2 包含圆境生态位、文化生态位等等。“圆境”一词见下文“‘具身哲学’：身脑本一体”。参见余红兵：《符号建模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

3 参见Yu Hongbing, “The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nd Cognitive Homeostasis,” *Cognitive Semiotics* (2024): forthcoming.

义的阐释，同时还限定了符号的自由及其生命力，给符号套牢了枷锁”（张杰 余红兵，“反思与建构”7）。

文学创作与接受中的伦理问题其实有着一个“三位一体”的关系，即作者、文学形象、读者之间的互动。如果只是关注文学形象之间伦理道德关系，而忽略与作者、读者的联系，就必然会导致对作者和读者的不伦理道德。由此来看，文学批评的任务并非是在把一种理解或意义转达给读者，而是提供“敞开”意义的具体范例，提升读者的文学鉴赏能力。比如，通过安娜“症状”的描绘，“还原”给读者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本身，让读者自己进一步去欣赏、理解，甚至体会。这不仅是规避符号表征“遮蔽”现象的有效途径，是对“关爱”作者与读者生命的重要伦理表达，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思想范式，即“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

二、“具身哲学”：身脑本一体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把人的大脑作为认知行为的发生者，而任何真理或知识的获取均是人的认知通过实践，与客观事实相符的结果，即所谓大脑理智的产物。然而，当代认知科学尤其是神经认知科学在过去数十年所取得的进展表明，认知并不仅仅依赖于大脑，而是以整个身体系统作为基础“发生”的。¹

这种思想范式已经在人文社科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比如，在语言学界，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就通过他们合著的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一书，强调了身体在人的语言认知活动中的重要意义，简而言之，理智与身体是相合的。而放眼文艺学界，在理智与身体或曰灵与肉之间，人们则往往更青睐于前者。大家通常依据的是索绪尔的语言观，即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文学创作则是作家以语言文本形式对所描述世界的艺术表征，也是作家伦理观、艺术观乃至世界观的文本体现。当然，这是艺术的表现，而并非作家思想的复制。因此，文学文本就成为文学批评的重点，甚至连文本的概念也都已经被扩展。比如，聂珍钊提出“脑文本”，用来指口头文学的文本。²

如果从具身性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发现，文学之为文学，归根结底在于人的本身，文学创作与接受都植根在人。而人并不是机器，是带着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情六欲的鲜活个体，是由大约三十万亿个人体细胞和

1 参见 Francisco J. Varela, Evan Thompson and Eleanor Rosch,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2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三十八万亿个微生物所构成的“共生总体”（holobiont）¹，俗称“超级生命体”（superorganism）²。这些巨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是每个人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作为自然因素的反应、作用，影响、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包括认知活动。结合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考察，“人的任何认知活动均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认知行为首先产生于大自然，没有大自然的反应，人类的认知活动就无从展开”（张杰 余红兵，“反向认知” 45）。我们把以人脑为出发点的认知视为“正向认知”，把以自然为出发点的认知视为“反向认知”，而以上事实就证明，反向认知无疑是第一性的，正向认知才是第二性的。另外，往大处看，人本身也只是大自然中间的一员，若是没有北极或南极冰山的融化、大气臭氧层的损耗和南极臭氧洞的形成等自然界的警告，人类还很难意识到要注意生态保护。天气的变化、泥土的芬芳、空气的清新等均是大自然发出的信息，这些都会影响到人的心境和情感等思维活动，就像在人体这个自然系统里无数人体细胞与非人体细胞通过协同作用，塑造了人的认知行为一样。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就是一个“认知生态”（ecology of cognition）的问题，即从生态的视角来看认知，或将认知视为一种生态活动。我们的关注点不仅要超越语言、文本，甚至连传统的“人”的概念都需要被重思。为分析需要，不妨将认知过程简化表述为：自然 → 身脑 → 文本。如此便走出了语言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在这个层面，佩特里利与 庞奇欧有类似的做法：西比奥克对人类中心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的符号学理论与实践有过明确的批评，指出了索绪尔“符号论”（semiology）的主要缺点，即只关注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意图符号，而佩特里利与庞奇欧的伦理符号学则基本沿用了西比奥克的这个立场，在方法论上对索绪尔的语言和符号定义进行了批判。佩特里利与庞奇欧也谈语言与文本的表征系统，并把它们与身体（包括人脑在内）联系在一起，但是他们认为这些系统与身体（包括人脑在内）存在于一种互身关涉、彼此意指的对话关系中。¹

尽管已经涉及到身体并把生命范畴拓展到了动植物界，但伦理符号学还是局限于把人作为认知行为的发出者，而且它所探讨的还是自然界的生命体。而在精神文化符号学那里，任何一个物体，即便是非生命体，也可以视为是活生生的“个性”。因为，认知行为的始作俑者是大自然（即“圜境”/

1 数据样本为身高 170 厘米、体重 70 公斤、年龄 20 至 30 岁的成年人。参见 Ron Sender et al., “Revised Estimates for the Number of Human and Bacteria Cells in the Body,” *PLoS Biology* 14 (8) (2016): e1002533. doi:10.1371/journal.pbio.1002533.

2 参见 Peter Kramer and Paola Bressan, “Humans as Superorganisms: How Microbes, Viruses, Imprinted Genes, and Other Selfish Entities Shape Our Behavi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2015): 464-481.

1 参见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Semioethic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ited by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2010, 153.

Umwelt)¹，是自然界那些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作用于人的身体（包括大脑），最终产生文本（广义），包括文学文本在内。文学作品形成于作家具体的创作过程。在此过程中，作家作为生命个体，其认知活动因为是具身性的，所以也必然受到周围人物事的影响。²此外，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并非只是将自己对生活的理性认识或观念形象化或生活化，更不是把自我的伦理道德观具体化，而往往是通过具身性的实际写作（同时自己也在接受，如耳听、目视等）活动，产生了内在的对话过程，似乎在聆听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的“小说的智慧”之音³，以至于会创作出连作家自己都无法预知的故事或人物。正因为如此，普希金才会感叹自己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Yevgeny Onegin*, 1833）的女主人公塔吉雅娜怎么会嫁人的，这位俄罗斯女神的化身为什么会嫁给了一位将军老头。也正因为如此，托尔斯泰最终写出了与《安娜·卡列尼娜》早期构思中迥然不同的安娜。

其实，作家的创作与其自身行为不一致甚至相悖的例子比比皆是。普希金的创作是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但是他自己却放弃“生”（“身”），而选择了决斗。如果返回到诗人本身的“症状”表征，如“愤怒”的表征等，读者就不难发现，普希金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男人或丈夫，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作家在创作中关爱“他者”的同时，在生活中则忽略了对“己者”的关爱，否则就不会在其短短三十八年的人生经历中，挑起和接受的决斗多达30次之多，最后死于跟丹特斯的决斗之中。普希金毕其一生的文学创作都是在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来表征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及其实现的理想路径。然而，创作是美好的，而现实是骨感的。文学创作倡导的“回归生活”与生活本身的难以实现之间的矛盾，即文学创作与作家身体行为之间的无法统一。昆德拉说“伟大的小说总是比它们的作者要智慧一点”（158），所言不虚。

说到智慧，人们通常想到的是与情感相对的“理性”，但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在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一书中所指出的：“理性并非像传统上多半认为的那样是脱离身体的，而是源于我们大脑、身体和身体经验的特性”（4）⁴。众所周知，人的理性以及意义生成主要依赖概念系统，但莱考夫和约翰逊表明：“因为我们的概念系统产生于我们的身体，所以意义是基于并通过我们的身体而产生”（6）。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义生成的活动，无论是在写、读还是听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基于和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身体感官渠道而生发出审美感。这些身体行为，其实都在帮助释放脑力，助力、影

1 “圆境”可以被理解为生物主体因其物种独特性以及个体独特性而能“获致”和“经历”的主体世界。参见 余红兵：《符号建模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页。

2 参见 Sian Beilock, *How the Body Knows Its Min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Influence How You Think and Feel*, New York: Atria Paperback, 2015.

3 参见 Milan Kundera, *The Art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Linda Ash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0, 158.

4 凡未特殊注明，引文均出自笔者拙译。

响、塑造意义生成。¹从“身体转向”的视角看文学，能够“把我们换回到肉体的自我面前，唤回到有所在、有具身、有实体的本真存在面前”（伊格尔顿 203）。

三、“各正性命”：“文本”到“本体”

文学创作作为一门以文学形象为载体的艺术，一定是审美与伦理的融合。诚如聂珍钊所言：“审美是发现文学伦理价值的方法与途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87）。而要实现文学的伦理启发功能，最终必然落到生命本身，即尽可能地发掘形象内在的美，而并非人为添加的各种外在限制因素。让文学形象回归自身，即由“文本”返回“本体”，与《易传》中“各正性命”的说法相映成趣。

万物各有各的性命、存在价值、存在位置，即各得其正（正为静定），即生态位，可以是圈境生态位、文化生态位等。“各正性命”并非支持宿命论，它所寻求的是从自然的视角恢复人的生命及生活本身该有的、自由且相对稳定的状态。这里的“性命”显然强调了生命与物体的自身，即“己者”，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己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己者”既包含着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内在“个性”特征。放在人物那里，更多的是指其身体“症状”，包含“体态”。而文学批评中的文学形象，只存在于文学文本中，这些形象有自己的“文本生态位”，在其中，他们有自己的“性”与“命”。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文本的分析就是着眼点。只有由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才能成为文学的基本载体，文学是文本的艺术。²确实，文学文本是不少文学批评流派探讨的中心，无论是形式主义批评，还是社会历史批评等，都是如此。只是文学批评从文学文本出发，最终走向何方，是一直停留在文本形式分析、社会环境揭示的维度，还是走进伦理道德的价值论空间？显然，伦理符号学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共同坚持的是后者。这是在全球视野中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学批评应该做出的选择。

然而，从文学文本出发，最终还有一层选择：是要归纳出各种伦理道德规范的意义，用以教诲读者，约束人的精神自由呢？还是应该返回“本体”，回归自然，还读者充分的自由，在意义的释放中，让人获得精神解放呢？其实，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演变的过程，即从自然→文明→自然。当然，后一个自然并非是一个自然的简单重复，并非是要回到原始丛林时代的自然，而是进一步提升，是经过文明洗礼过后的自然，是保存着人类文明演化印迹的自然。回归自然的向度，似乎是文明的一个内在必然趋势，即便文明意味着对意义生成的导向

1 参见 Sian Beilock, *How the Body Knows Its Min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Influence How You Think and Feel*, New York: Atria Paperback. 2015, 230-232.

2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甚至控制。其实,伦理符号学返回“症状”对于文学伦理批评的价值也就在此。但这并非是要文学批评重新发掘人的本能、无意识、甚至包括性欲在内的各种欲望冲动,而是要回归到本体中,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以达到净化人的心灵、实现更高层次的伦理启发。毕竟,文学创作并非总是在反映生活,更重要的是过滤掉社会生活中的功利色彩,返回无利害关系的自然本体和人性的本真。此类例子在文学创作中比比皆是。

我们以钦吉斯·托瑞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Чингиз Торекулович Айтматов)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Jamila*, 1998)为例。小说简洁动人、意境优美,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通过一个正直善良的少年视角,细腻描绘了一对吉尔吉斯青年的真挚爱情。女主人公查密莉雅性格爽朗、聪明能干,是叙述者“我”的漂亮可亲的嫂子。在叙述者“我”看来,哥哥并不疼爱她,上前线后从不单独给查密莉雅写信。查密莉雅干活勤快,歌声笑语不断,但故事的男主人公、从前线回来的伤残退伍军人丹尼亚尔则孤僻深沉、少言寡语,甚至对查密莉雅等的嘲笑也不理睬。后来,在赶车运送军粮的过程中,“我”和男女主人公结伴而行,在查密莉雅山歌和言语的鼓励下,丹尼亚尔放声歌唱。“我”第一次听到如此深情动人的歌。这歌声也深深打动了查密莉雅,她也因此改变了。“我”觉察到查密莉雅既愿意又不愿意承认自己陷入了爱情之中,就如同“我”一样,既希望又不希望她与丹尼亚尔相爱,因为她毕竟是“我”父母的儿媳,是“我”哥哥的嫂子。终于这对男女主人公,在“我”哥哥回到家之前私奔了。家里只有“我”懂得丹尼亚尔才真正理解和爱着查密莉雅。“我”的毕业创作画了两个旅伴走向远方,这幅朴素的小画是“我”构思许久最为满意、最为亲切的作品。¹

显然,从现实社会的维度,查密莉雅与丹尼亚尔的行为无疑是不合乎伦理道德规约的,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也不足为奇。但是,所有的故事情节在一个少年的“我”的视野中展开。这层少年滤镜,过滤了世俗的偏见和现实的道德,把自然的人性与现实的生活隔开,让男女主人公的行为回到了自然之域,回了人的性命本身。小说以“敞开”的艺术形式,给读者以接受和解读的自由。这就是伦理的审美体现,使得现实中应该谴责的事件转化为了美好的、动人心弦的童话般的传说。文学创作的结果并非是现实生活本身,文学也不只是通过表征反映生活,而应该是挑战现实,引领社会生活。社会的现实往往是骨感的,而文学的世界则是丰富美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往往难以得到认可或无法表达思想和事件,可以由文学创作来实现。也许,生活走到了尽头,无法继续下去了,文学就出现了。因此可以说,文学通过对文本世界的创造与超越,助力人类打通反观自身、回归本真的理想通道。

总而言之,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独特的形象构建艺术,并非是要直接宣传

1 参见 钦吉斯·托瑞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力冈、冯加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或弘扬某种普遍承认的价值观或道德观，而是应该充分展示形象本身，甚至是复杂的矛盾生命体。这种由“文学文本”回归“性命本体”的文学创作或批评路径，或许才是值得提倡的，也是最为伦理道德的。这也应该是伦理符号学批评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是融伦理道德在内的、更高层次的自然选择。人类是从自然中来，在伦理选择中迈入文明社会，又在科技选择中进入“超”自然的社会，之后必然又会折返入新的自然状态。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返回“症状”、转向“身体”、最终回归“本体”的研究思路，或许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符号学研究路径，也应可以为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的伦理价值提供有益参考。

Works Cited

- 钦吉斯·托瑞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查密莉雅》，力冈、冯加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
- [Aitmatov, Chingiz Torekulovich. *Jamila*, translated by Li Gang and Feng Jia. Beijing: Foreig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
- Beilock, Sian. *How the Body Knows Its Mind: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Influence How You Think and Feel*. New York: Atria Paperback, 2015.
- Blaisdell, Bob. *Creating Anna Karenina: Tolstoy and the Birth of Literature's Most Enigmatic Heroine*.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20.
- Cassirer, Ernst.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P, 2021.
-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Eagleton, Terry.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Desire in the Historical Novel*, translated by Ma Haili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 Kramer, Peter and Paola Bressan. "Humans as Superorganisms: How Microbes, Viruses, Imprinted Genes, and Other Selfish Entities Shape Our Behavior."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 (2015): 464-481.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Kundera, Milan. *The Art of the Novel*, translated by Linda Ashe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0. 158.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71-

92+205-206。

[—, “Value Choice an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0 (2020): 71-92+205-206.]

——: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聂珍钊、王松林: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Nie Zhenzhao and Wang Songlin. *A Study on the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0.]

Petrilli, Susan and Augusto Ponzio. “Semioethic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edited by Paul Cobley. London: Routledge, 2010. 150-162.

Sebeok, Thomas A.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P, 2001.

Sender, Ron et al. “Revised Estimates for the Number of Human and Bacteria Cells in the Body.” *PLoS Biology* 14 (8) (2016): e1002533. doi:10.1371/journal.pbio.1002533.

列夫·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 力冈译。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Tolstoy, Leo. *Anna Karenina*, translated by Li Gang.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2.]

Varela, Francisco J., Evan Thompson and Eleanor Rosch.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王弼: 《周易注校释》, 楼宇烈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年。

[Wang Bi. *The Book of Changes (I Ching)*, annotated and revised edition, edited by Lou Yuli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2.]

Yu Hongbing. “The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nd Cognitive Homeostasis.” *Cognitive Semiotics* (2024): forthcoming.

——. “Confucius the Untouchable: On the Semiotics of Historization.”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3 (2022): 319-412.

余红兵: 《符号建模论》。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 *On Semiotic Modeling*. Soochow: Soochow UP, 2019.]

Zhang Jie and Yu Hongbing. “A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A Manifesto.”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4 (2020): 515-534.

张杰、余红兵: “反思与建构: 关于精神文化符号学的几点设想”, 《符号与传媒》1 (2021): 1-13。

[—,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Ideas on Cultural Semiotics of Jingshen.” *Signs & Media* 1 (2021): 1-13.]

——: “反向认知: 自然主体论的思维范式阐释——再论精神文化符号学的认知模式”, 《外语与外语教学》3 (2023): 43-51。

[—, “Reverse Cognition: on the Natural Subjectivist Paradigm of Know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2023): 43-51.]